

学前教育理论

特殊的学前教育教材：《帝鉴图说》的教育内涵与历史经验

蒋丽萍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上海 200062)

摘要:张居正所编《帝鉴图说》作为幼帝启蒙教材,因其教育对象身份及其未来发展要求的特殊性,展现出了不同于普通童蒙读本的特点。其一,《帝鉴图说》在万历皇帝的教育过程中起到的是先发性启蒙作用,解决了万历皇帝形成圣主明君初步认识的问题,在教育目标上具有针对性。其二,《帝鉴图说》围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培养目标,从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君王个人三个层面,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上紧扣培养目标。其三,《帝鉴图说》采用了适切的教育方法,在万历初年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成效。《帝鉴图说》以绘本为主要编辑形式,语言通俗、图文并茂,遵循儿童的心理特点。教育过程中,张居正以《帝鉴图说》为据,采用正反面教育相结合,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教育方法,教育意味强。教育文本取材上,引文以史书为主,取材独到,语言表达上,采用温和的说理方式,更易于教育对象接受,显示出了帝王教育的用心之处。

关键词:《帝鉴图说》; 幼帝教育; 教育目标; 教育内容; 教育方法

中图分类号: G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 (2023) 03-0052-10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23.03.007

A Special Pre-school Textbook: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Historical Lessons of Tutorial Pictures for the Emperors

JIANG Li-p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As a textbook for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young emperor, Zhang Juzheng's *Tutorial Pictures for the Emperors* exhibits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rdinary children's books, due to the special nature of its target audience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Firstly, the book plays a pioneering role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Wanli emper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 of forming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holy lord and the wise ruler, and being relevant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Secondly, the book focuses on the training objective of cultivating one's own body and family, ruling the country and pacifying the world, and includes 117 allusion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ler and subject, ruler and people, and the personalities of kings, which are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 training objective in the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Thirdly, the book adopted an appropriate educational approach and achieved good educational results in the early Wanli period. It is mainly edited in the form of an illustrated book, with popular language and illustrations, and follows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Zhang Juzheng used the *Tutorial Pictures for the Emperors* as the basis for a combina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ducation, with positive education as the main focus, which had strong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The text is based on historical texts, which are unique, and the language used is gentle and reasoned, which makes it easier for the audience to accept, showing the dedication of the emperor's education.

Key words: *Tutorial Pictures for the Emperors*;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 Emperor; Educational Objectives; Educational Content; Educational Methods

收稿日期: 2022-12-05; 修回日期: 2023-01-17

作者简介: 蒋丽萍, 女, 浙江青田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硕士研究生。

1658年,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发行《世界图解》,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图文并茂的儿童启蒙识字教材,全书共148个主题,涉及了宗教、自然、科学、社会生活、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对西方儿童启蒙教育有着重要启示作用。而早在1572年,明代张居正所编《帝鉴图说》,立足于儿童与皇帝的双重特殊性,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通过“善可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教导幼年万历皇帝,达到“远追二帝三王之治”^[1]¹⁹⁴的目标,比《世界图解》早了80余年。且《帝鉴图说》作为幼帝启蒙读本影响甚广,明清时期先后有八种刻本流行于世,日本、法国等地也有多种版本流传^①,明清两代实录中也有《帝鉴图说》应用于幼帝教育的实证。《帝鉴图说》作为幼帝启蒙读本的典型代表,取得了成功,总结其成功之道,便在于它所体现的幼帝教育目标的针对性、教材内容选择的妥当性、教育方法的适切性。

一、有针对性地确立教育目标

张居正对万历皇帝幼年教育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隆庆四年(1570年),张居正上《请皇太子出阁讲学疏》说明利弊,力主年已八岁的皇太子朱翊钧早些学习,其后至万历元年(1573年)的三年间,张居正先后上《乞崇圣学以隆圣治疏》《进帝鉴图说疏》《请开经筵疏》《进讲章疏》,给万历皇帝的教育提出了整体性的规划与安排。张居正一方面改进了宋代以来的皇子日讲经筵制度^[1]⁷³,为万历皇帝提供了更科学的学习方式;另一方面,他为万历皇帝先后编撰了《帝鉴图说》《大学直解》等学习读本,以满足万历皇帝不同阶段的学习需求。可见,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培养,是成体系的、有阶段性的。

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张居正进《帝鉴图说》,一年后进《大学直解》^[2]¹⁴⁰⁻¹⁴²。《帝鉴图说》通过“考究历代之事……后录传记”^[2]¹⁰³⁻¹⁰⁷为万历皇帝讲述了117个古代皇帝的故事,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故,树立历史上圣王明君的形象,促使万历皇帝初步形成正确的“帝王认识”和效仿“二帝三王”的观念。《大学直解》则是解决“帝王认识”之后的行动问题,给出了成为圣王明君

的具体做法,全面系统地揭示《帝鉴图说》中蕴含的为君、为政之道,与《帝鉴图说》形成和谐的衔接。同时,《大学直解》将解经和帝王的政治实践教育相结合,将《帝鉴图说》中分散在各个故事中的为君、为政道理进行整合归纳,构建了张居正的“圣王期待”。两书共同为幼年万历皇帝的学习奠定了基础,而两书不同的定位,则显示出张居正对万历皇帝不同阶段教育的考量。

张居正推崇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以朱熹“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3]¹⁸⁶的思想为指导,一方面确定万历皇帝识字后,读“四书”,“四书”中先读《大学》的顺序;另一方面,明确《帝鉴图说》与《大学直解》的不同定位——《帝鉴图说》展现的是表面的道理,《大学直解》揭示了事物深层次的道理和正确的做法。张居正《帝鉴图说》中所蕴含的对万历皇帝的培养目标延续到《大学直解》中,进一步明晰万历皇帝的学习方向。

从教育目标的方向来看,《帝鉴图说》旨在解决万历皇帝对古代圣主明君的认识判断问题。张居正在《进帝鉴图说疏》中,首先给出了古代圣主明君的模范,并以此为纲,编录了《帝鉴图说》的主要内容。

臣等尝因是考前史所载治乱兴亡之迹,如出一辙。大抵皆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国勤惕厉,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谏遂非、侈用、虐民、亲小人、远贤臣、盘乐怠傲,即说乱^[2]¹⁰³⁻¹¹⁷。

《大学直解》则是基于认识判断问题,系统揭示了《帝鉴图说》“治乱兴亡”典故背后的道理。《大学直解》所呈现的万历皇帝的培养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张居正在《大学直解》中指出,“大学之道……乃学者之要务,而有天下之责者,尤当究心也”,认为“人君尤宜深省”^[1]¹¹⁰。同时,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从修身上推去。所以人之尊卑,虽有不同,都该以修身为本也。”^[4]³

从教育目标的细节来看,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设置了与幼帝身份相匹配的有针对性的教育目标——主要分为“内修”(修身)、“外修”(治国平天下)两个方面,并在两书中,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强调。

“内修”方面,《帝鉴图说》收录了37则典故,从正反两个方面,讲述历代君王在知识学习、政务处理、自省自律、尊师重道、正视天道等方面的事迹,对万历皇帝提出个人知识政务修养、品德修养、正确天道观三个层面的要求。《大学直解》中,张居正以周文王、商汤、唐尧为例子,讲“内修”的要求具体化,阐明君王首先应做到“明明德”,之后应该从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两个方面做到圣王“修身”。

在达到“内修”的目标之后,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设置了更有针对性的“外修”目标。这一层面的目标对于普通士子而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5] 203}的有选择的目标,而对于万历皇帝而言,“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必须达到的责任和义务。

“外修”方面,《帝鉴图说》中有80则典故,正面典故涵盖孝顺父母、教导子女、兄友弟恭、知人善用、亲贤远佞、虚心纳谏、体恤臣下、仁爱之心、以民为本、惜福节用、崇儒重教等内容,反面典故涵盖不敬祖宗、亲近嬖佞、封闭言路、穷奢劳民、毁文灭教等内容。张居正也在《帝鉴图说》“述语”中,阐述了前代历史的至圣明哲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罗列了圣主明君的榜样形象。相比于《帝鉴图说》所涵盖的“外修”目标,《大学直解》的“外修”目标显得更有层次,更加明晰。张居正首先在《大学直解》中明确了齐家的必要性,教导万历皇帝要将皇室中的“孝、悌、慈”三行以己身推及一国、惠及百姓,张居正认为君者是臣民的表率,君者之家也必为一国所效仿,故而“为人上者,可不戒贪戾以绝祸乱之端,而躬行仁让,以为定国之本。”^{[4] 12}在达到“齐家”的目标之后,张居正围绕着“君子絜矩之道”,为万历皇帝如何做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提供了重民、善用人、明义利三条路线。

从《帝鉴图说》与《大学直解》的“治国

平天下”的具体“外修”目标的对照上看,《帝鉴图说》中正面典故所涵盖的以民为本、仁爱之心、惜福节用、崇儒重教,反面典故所涵盖的穷奢劳民、毁文灭教等内容与《大学直解》中所提出的“治国平天下”的重民、明义利路线形成衔接,《帝鉴图说》中正面典故所涵盖的知人善用、亲贤远佞、虚心纳谏、体恤臣下,反面典故所涵盖的亲近嬖佞、封闭言路等内容与《大学直解》中的用人路线相匹配。

可见两书在对万历皇帝的具体培养目标上呈现出递进式的特点。《帝鉴图说》中,张居正以故事形式讲述古代君王在个人修身方面的正反事迹,同时在每则典故之后的“解”中,指出该则典故值得学习或应引以为戒之处。《大学直解》则是基于《帝鉴图说》的认识基础,更系统、更有逻辑地讲述了圣主明君的“内修”“外修”目标及具体的做法指导。总的来说,万历初年,张居正为万历皇帝的启蒙教育编写《帝鉴图说》,为更好进行经筵日讲编写了《大学直解》,其间,“培养君德,开导圣学”^{[2] 70}的中心主旨未变,两书在学习逻辑上由易入难、由简入繁,形成顺畅的学习衔接,共同体现了张居正对万历皇帝始终如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标设置。

二、妥当地选择教育内容

基于对万历皇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王教育目标,张居正上《乞崇圣学以隆圣治疏》请求先开日讲,并围绕“培养君德,开导圣学”的“当今第一要务”^{[2] 70},于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进《帝鉴图说》,以期万历皇帝能“德可媲于尧舜,治将埒于唐虞”^{[2] 103}。《帝鉴图说》全书收录上古尧舜时期到北宋三千余年间历代帝王典故117则,依据《周易》中以九为阳,六为阴的规范,阳为善、阴为恶^②,以九九八十一和六六三十六为数,将全书分为上下两编。按照朝代顺序选取其中“善可法者八十一事”编成上编“圣哲芳规”,选取其中“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编成下编“狂愚覆辙”。《帝鉴图说》相关典故的选择与组织也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预期。

第一,张居正以万历皇帝“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 的圣王教育目标为中心,对《帝鉴图说》的辑录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选择与编排。如下表 1 所示,全书两编辑录的典故按照君王需要具备的素质,大体上可以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层面。修身层面,《帝鉴图说》指出君王要做到勤政务学、自律持德、勇于自省、尊师重道、正视天道,不应贪恋酒色、荒于逸乐、误信天道。“齐家”层面,君王要做到孝顺父母、教导子女、兄友弟恭,不可不敬祖宗。在治国平天下层面,则提出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两方面的要求。在君臣关系方面,圣王应该要做到知人善用、亲贤远佞、虚心纳谏、体恤臣下,不应亲近嬖佞、封闭言路;在君民关系方面,圣王应该做到仁爱之心、惜福节用、以民为本、崇儒重教,不应穷奢劳民、毁文灭教。

表 1 《帝鉴图说》篇目与分类

编目	分类	条目	篇目
圣哲芳规	修身	勤政务学	感谏勤政; 夜分讲经; 延英忘倦; 屏书政要; 竟日观书; 改容听讲
		自律持德	戒酒防微; 却千里马
		勇于自省	下车泣罪; 遣辛谢相
		尊师重道	丹书受戒; 临雍拜老
		正视天道	德灭祥桑; 纵鹊毁巢; 遣归方士; 不受贡献
	齐家	孝顺父母	孝德升闻; 敬受母教
		教导子女	遇物教储
		兄友弟恭	兄弟友爱
	治国平天下	知人善用	任贤图治; 梦賫良弼; 任用三杰; 蒲轮征贤; 褒奖守令; 宾礼故人; 君臣鱼水; 委任贤相; 召试县令; 淮蔡成功
		亲贤远佞	明辨诈书; 爱惜郎官; 面斥佞臣; 烧梨联句
狂愚覆辙	修身	虚心纳谏	谏鼓谤木; 揭器求言; 止辇受言; 纳谏赐金; 不用利口; 葺槛旌直; 拒关赐布; 赏强项令; 上书粘壁; 纳箴赐帛; 敬贤怀鹄; 主明臣直; 望陵毁观; 听谏散鸟; 论字知谏; 受言书屏; 引衣容直; 纳谏遣女; 天章召见
		体恤臣下	屈尊劳将; 撤殿营居; 剪须和药; 焚香读疏; 解裘赐将; 烛送词臣
		仁爱之心	解网施仁; 泽及枯骨
		以民为本	桑林祷雨; 入关约法; 览图紧杖; 纵囚归狱; 遣使赈恤; 受无逸图; 后苑观麦; 轸念流民
		惜福节用	露台惜费; 焚裘示俭; 留衲戒奢; 焚锦销金; 啖饼惜福; 碎七宝器; 戒主衣翠; 不喜珠饰; 夜止烧羊
	治国平天下	崇儒重教	过鲁祀圣; 诏儒讲经; 弘文开馆
		贪恋酒色	脯林酒池; 姐己害政; 戏举烽火; 宠昵飞燕; 金莲布地; 纵酒妄杀; 剪彩为花
		荒于逸乐	游畋失位; 八骏巡游; 市里微行; 列肆后宫; 羊车游宴; 华林纵逸; 玉树新声; 便殿击球; 宠幸伶人
		误信天道	革囊射天; 遣使求仙; 女巫出入; 舍身佛寺; 上清道会
		不敬祖宗	笑祖俭德; 观灯市里
治国平天下	齐家	亲近嬖佞	五侯擅权; 十侍乱政; 西邸鬻爵; 斜封除官; 宠幸番将; 任用六贼
		封闭言路	嬖佞戮贤
	治国平天下	穷奢劳民	大营宫室; 芳林营建; 游幸江都; 敛财侈费; 应奉花石
		毁文灭教	坑儒焚书

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来看,上编“圣哲芳规”收录的81则典故中,有“修身”相关的典故16则,“齐家”相关的典故4则,“治国平天下”相关的典故61则;下编“狂愚覆辙”收录的36则典故中,有“修身”相关的典故21则,“齐家”相关的典故2则,“治国平天下”相关的典故13则。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层面目标分别收录的典故数量在全书收录典故总数的占比来看,“修身”相关的典故37则,“齐家”相关的典故6则,“治国平天下”相关的典故74则,“治国平天下”相关的典故占比最重,达到全书收录典故的六成,可见,作为君王,最终的、最重要、也是区别于一般人的素质目标在于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圣王境界。

第二,张居正在处理君王定位的特殊问题上,也有细致的考虑。张居正在对万历皇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王目标基础上,对万历皇帝提出了更为重点、深入的要求,这一要求体现在《帝鉴图说》的内容分布与频次的差异上。这一数量差异,也体现了张居正本人对万历皇帝的“圣王”期待,他认为“圣王”最需要处理好三个关键便是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和君王个人的问题。

在君臣关系上,张居正主张君王应做到虚心纳谏、知人善任、分辨忠奸、体恤臣下四个方面。《帝鉴图说》上编收录了“知人善用”“亲贤远佞”“虚心纳谏”“体恤臣下”四个模块的典故,下编收录了“亲近嬖佞”“封闭言路”两个模块的典故,共有46则,占收录典故的四成。更值得注意的是,《帝鉴图说》全书收录历代帝王能否虚心纳谏相关典故共20则,占君臣关系相关典故数量的一半。可见,张居正对皇帝处理君臣关系的问题是高度重视的。而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他最看重皇帝是否具备虚心纳谏的品质。根据全书的典故数量统计,唐太宗与魏征君臣相关典故有“主明臣直”“撤殿营居”“敬贤怀鹄”“望陵毁观”4则,而在张居正将《帝鉴图说》进献给万历皇帝时,也说:“伏念臣猥以迂疏,谬蒙知遇。虽无伊尹致其君必为尧舜之学,实有魏征劝其主力行仁义之心。故每因事以纳忠,盖以责难而为敬。”^[2]¹¹⁵⁻¹¹⁶可见,张居正作为臣子兼帝师,希望与万历皇帝构建唐

太宗与魏征的君臣关系模式——君臣之间君王做到虚心纳谏,臣子做到勇于直谏。

在君民关系方面,张居正倡导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君民关系,他认为皇帝应该处理好观念、待民、育民三方面的问题。观念上,君王要有仁爱之心,要以民为本、惜福节用,同时重视百姓的文化需要,做到崇儒重教。全书收录了君民关系相关典故28则,占收录典故的三分之一,其中劝导万历皇帝惜福节用的典故数量最多,共计14则,占君民关系相关典故数量的一半。由此可见,张居正对万历皇帝体恤民情、勤俭戒奢品质的强调,这一强调在《帝鉴图说》为数不多的讲授记录中也能找到实证。万历元年十月,张居正在给万历皇帝讲授“不喜珠饰”,万历在张居正讲解之后,发出感慨“贤臣为宝,珠玉何益?”^③。张居正随后解释“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金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书称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良以此耳!”^④。同时,张居正启发万历皇帝重视农业和粮食,不要看重奢侈品。万历帝说道,“宫人好妆饰,朕岁赐每节省。宫人以为言,朕云库积几何?”张居正大加赞赏,认为万历皇帝在勤俭戒奢之道上的想法是“社稷生灵之福”^⑤。

在君王个人问题上,张居正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更直接地构建了他所期待的“圣王形象”。这一要求,在书中以君王“修身”层面的目标呈现,主要解决的是君王个人的问题。张居正认为,圣王在个人“修身”方面应该做到“圣哲芳规”中指出的勤政务学、自律持德、勇于自省、尊师重道、正视天道,规避“狂愚覆辙”中贪恋酒色、荒于逸乐、误信天道等做法,“圣王”个人需要笃行孝悌、勤政务学,戒游逸、酒色、贪奢,同时,正确认识天道祥瑞,敬天法祖。《帝鉴图说》上编收录了31位君王“善为可法者”的典故81则,将这些君王可供借鉴的素质集合起来,便有了一个“圣王”的形象。

据表2,上编所收录的81则典故,涉及31位古代君王,有相当数量的君王被重复收录。其中,高频收录的君王有三位,唐太宗14次,汉文帝7次,宋仁宗7次。可见,张居正在制定“圣王”的

培养目标之外,还意在标榜“君王的楷模”,在张居正“圣王”标准之下,他也希望万历皇帝能够以唐太宗、汉文帝、宋仁宗等皇帝事迹为榜样,达到“远追二帝三王之治”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张居正也采取了独到的教育方法,使得《帝鉴图说》在万历初年经筵日讲制度难以取得成效时,充分吸引了万历皇帝。

表 2 《帝鉴图说》上编 31 位君王典故收录频次

皇帝	收录频次
尧	2
舜	1
禹	3
汤	2
太戊	1
商高宗	1
周文王	1
周武王	1
周宣王	1
汉高祖	3
汉文帝	7
汉武帝	1
汉昭帝	1
汉宣帝	2
汉成帝	1
汉光武帝	3
汉明帝	2
汉昭烈帝	1
晋武帝	1
宋高祖	1
唐太宗	14
唐玄宗	5
唐肃宗	2
唐宪宗	4
唐穆宗	1
唐宣宗	2
宋太祖	5
宋太宗	2
宋仁宗	7
宋神宗	1
宋哲宗	1

三、适切地选择教育方法

明代皇子经筵日讲制度虽有成效,但偏重程式化,十分枯燥,是时万历皇帝年仅 10 岁,读经的兴趣并不大。《帝鉴图说》作为童蒙读本,首先立足于万历皇帝正值冲龄的特点,满足了万历皇帝作为儿童的心理特点与需要,采用了适切的教育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一) 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相结合

张居正希望万历皇帝“视其善者取以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2] 103-117},故而在教育方法上,采用了与《太公家教》《蒙求》《龙文鞭影》等蒙学读物类似的正反面教育相结合,并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方法。在《帝鉴图说》的内容选择与编排上,注意正反面典故相结合,在收录君王典故时注意突出君王所需要的素质,同时注意体现同一人物的不同侧面。

《帝鉴图说》的内容选择与编排,包含了正面的典故与反面的典故两个方面。全书分“圣哲芳规”与“狂愚覆辙”上下两编,分别讲述尧舜至唐宋 57 位帝王的典故,在帝王人数上,正面典故所涉及的帝王 31 人,反面典故所涉及的帝王 26 人。在典故内容上,正面典故 81 则,反面典故 36 则,上下编收录典故数量相差一倍有余。可见,张居正旨在以正面典故引导为主、反面典故劝谏为辅,教育万历皇帝以达到“圣王”的目标。

张居正通过《帝鉴图说》堆砌正反两方面的典故,揭示君王需要的素质,利用典故讲道理。如关于厉行节俭方面,在上编与下编均有相关典故。上编收录“露台惜费”“焚裘示俭”“留衲戒奢”“焚锦销金”“啖饼惜福”“碎七宝器”“戒主衣翠”“不喜珠饰”“夜止烧羊”等 9 则正面典故,阐明圣王要爱惜民财的道理,在营造、衣着、饮食、器物等方面提倡节俭,避免奢侈。下编中则有“大营宫室”“芳林营建”“游幸江都”“敛财侈费”“应奉花石”等 5 则反面典故,讲述了秦始皇、魏明帝、隋炀帝、唐玄宗、宋徽宗大兴土木、游行奢靡、劳民伤财的故事。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故,教导万历皇帝厉行节俭的好处与坏处,帮助万历皇帝养成节俭戒奢的品质。

《帝鉴图说》所体现的正反面教育结合的教育方法,还体现在选择人物的时候,注意体现同一人物的不同侧面。如收录进上编的汉武帝、汉成帝、晋武帝、唐玄宗四位皇帝,同时也作为反面典故的主人公在下编中(见表3)。

表3 《帝鉴图说》收录皇帝正反典故频次		
皇帝	上编收录频次	下编收录频次
汉武帝	1	1
汉成帝	1	3
晋武帝	1	1
唐玄宗	5	2

这显然是张居正在内容编排上刻意为之,分别收录四位皇帝“善为可法者”“恶可为戒者”的典故,并借此教导万历皇帝为君者应当慎终如始、终始如一,不能有丝毫懈怠,如此才能达到“圣王”境界。同时,张居正也教导万历皇帝,人并非完美无瑕的道理,应择善从之,正确看待人的不同侧面。

《帝鉴图说》上、下编均收录了唐玄宗相关的典故,上编有“焚锦销金”“委任贤相”“兄弟友爱”“召试县令”“听谏散鸟”5则,下编有“宠幸番将”“敛财侈费”2则,唐玄宗个人事迹前后对比突出,教育意味强。张居正借此说明“人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有始治而终乱,由圣而入狂者。古圣帝明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的道理,又结合实际,以本朝嘉靖皇帝早年勤民务民,晚年崇尚道家之学的具体事例为例,教导万历皇帝“民怀其始,未保其终”。

(二) 一般的教育与特殊的教育相结合

《帝鉴图说》作为万历皇帝的启蒙教材,既遵循普通童蒙教材有的规律,又对其教育对象有特殊的考虑。前代《千字文》《蒙求》《太公家教》《三字经》等童蒙读本的教育对象是大众儿童,在文本内容的表达上多是指示、训诫。而《帝鉴图说》的教育对象是幼年的万历皇帝。一方面万历皇帝也是儿童,故而《帝鉴图说》具备童蒙教育的一般性;另一方面,万历皇帝身份的特殊性及其未来发展要求的特殊性,使得《帝鉴图说》在语

言表达方式、典故取材等方面都显示出其独到性。此外,《帝鉴图说》还包含了作为幼帝的特殊学习内容。

从语言表达方式上看,一般童蒙教材,有说理的、训诫的、叙事的等多种表达方式,如《千字文》以训诫、叙事两种方式,完成儿童识字目标,教导儿童天地自然、为人修养、入仕、出世等内容。《太公家教》全文以训诫为主,为儿童忠孝、仁爱、修身、勤学提供了规范性要求^[6]。而《帝鉴图说》则对这些表达方式进行了过滤与筛选,采用的方法更多是说理的,而不是训诫的,在表达上是谨慎而不冒犯、委婉而恭敬的。这一方式的选择和受教者与施教者身份的特殊性是分不开的。

从教育关系上来看,施教者是张居正,受教者是万历皇帝,但从政治身份来看,张居正是臣子,万历皇帝是君上,这使得《帝鉴图说》的语言表达方式区别于普通的童蒙读物。张居正选择了一种既可以传达特殊讯息、又不会直接冒犯君上的方式——使用过往的典故,讲述蕴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验教训的前代君主事迹,引导、启发万历皇帝。这一方式充分体现在张居正所撰写的“解”上。张居正的“解”中,以“就史论史”为主,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温和地解释、讲述,并无直接对万历皇帝提出要求的表述,用词不可谓不谨慎。如上编“揭器求言”一则,“解”中了解释原文外,仅一句“夫禹是大圣,聪明固以过人,而又能如此访问,则天下事物岂有一件不知,四方民情岂有一毫壅蔽?此禹之所以为大,而有夏之业所由以兴也。”^{[1]10}只是阐明善于纳谏是禹建立夏朝、兴盛夏朝的重要因素,然后戛然而止,由万历皇帝自己感悟这则典故中蕴含的先贤经验,体会道理。

从取材上看,一般童蒙教材同《帝鉴图说》一样,糅合了历史知识,牵涉到众多历史人物与事件,如《蒙求》以传说人物故事、历史人物故事为主,帮助儿童识字。《帝鉴图说》则立足于幼帝的特殊身份与培养为“圣王”的教育目标,格外重视史书的教育意义,与一般童蒙教材相比,《帝鉴图说》大量引用历史著作,这在童蒙教材中是比较少见的。

《帝鉴图说》在收集典故时,直接转引原文,“书中所载皆史册所有”^{[7] 761},以备万历皇帝作延申学习。立足于殷鉴历史的出发点,《帝鉴图说》的典故主要取材于史书、先秦典籍、政书类等文、史、政著作,少部分来自于唐宋笔记,《帝鉴图说》篇目出处频次与分类具体如下表 4。

表 4 《帝鉴图说》篇目出处频次与分类 ^④		
篇目出处	频次	原书类别
《鬻子》	1	子部
《尚书》	4	经部
《穆天子传》	1	史部
《国语》	2	史部
《吕氏春秋》	1	子部
《史记》	14	史部
《大戴礼记》	1	经部
《说苑》	1	子部
《汉书》	12	史部
《后汉书》	7	史部
《帝王世纪》	1	史部
《三国志》	2	史部
《晋书》	2	史部
《宋书》	1	史部
《陈书》	1	史部
《南史》	1	史部
《北史》	1	史部
《贞观政要》	1	史部
《隋唐嘉话》	3	史部
《安禄山事迹》	1	史部
《次柳氏旧闻》	1	子部
《邺侯家传》	1	史部
《旧唐书》	10	史部
《新唐书》	4	史部
《资治通鉴》	21	史部
《元城语录解》	1	子部
《资治通鉴外纪》	3	史部
《续资治通鉴长编》	7	史部
《闻见近录》	1	子部
《东山笔录》	1	集部
《宋史》	9	史部

从《帝鉴图说》所收录的书籍种类看,《帝鉴图说》所涉及的典故分布于中国古代 31 本典籍,按照原书类别分类,其中经部典籍 2 本,史部典籍 22 本,子部典籍 6 本,集部典籍 1 本,史部典籍占比六成有余。从《帝鉴图说》的具体篇目出处看,117 则典故中,5 则出自经部典籍,105 则出自史部典籍,6 则出自子部典籍,1 则出自集部典籍,出自史部典籍的典故占比近九成。可见,《帝鉴图说》典故出处类别的数量差,充分反映了其取材的独到性。从《帝鉴图说》典故出处的类型来看,出自《资治通鉴》系列史书的典故占比最大,共计 31 则,其次是《史记》14 则,《汉书》12 则,《旧唐书》10 则,宋史 9 则。由此可窥见,张居正重视“史鉴”“资治”作用,希望万历皇帝“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验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终箴之功,覆辙在前,永作后车之戒”^{[2] 103-117}的愿望。

从特定内容的选择上看,《帝鉴图说》包含了皇帝学习的模块。如下编“狂愚覆辙”中选取了“脯林酒池”“姐己害政”“戏举烽火”“宠昵飞燕”“金莲布地”“华林纵逸”“玉树新声”7 则典故,内容为皇帝因宠信后宫,沉迷于女色而荒废朝政。张居正选取此几则故事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历史上确有不少因沉迷美色误国的君王,更是想要以史为鉴,引导年幼的万历皇帝不要重蹈历代暴君覆辙。

（三）文字的教育和图像的教育相结合

《帝鉴图说》的编写讲究“欲触目生感,故假象于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于俚俗”^{[2] 103-117},采用文字的教育和图像的教育相结合的形式,每则典故统一采用四字标题,配以一幅插图、史书中一段简单的引文以及一段用当时白话书写的注解,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对应的典故。

《帝鉴图说》考虑到了“幼帝的学”和“帝师的教”的需要,以精炼的语言表达内容,所引用的典故,大多在五十字至一百字,最长的“纳箴赐帛”一则也不足三百字,阅读量不大,不容易让万历皇帝产生厌烦情绪。同时,《帝鉴图说》充分考虑万历皇帝作为儿童的年龄特点,所选每则典故均有人物、有情节,典故内容生动有趣,其所呈现

的“故事书”的形式不同于经筵日讲的枯燥内容,容易被万历皇帝接受。每则典故后附的“解”,一方面用白话解释了所选典故;另一方面,表达了张居正对典故的评论,引导万历皇帝思考。《明实录·神宗实录》载,“上遽起立,目左右展册,居正一一指陈大义,上应如响,其不待指陈能自言其义者,十居四五”^⑤。“解”的存在,使得全书通俗易懂,阅读难度下降,可自学、有讲解,便于万历皇帝学习接受,也为幼年神宗写作能力的养成提供了条件。

《帝鉴图说》在每一则典故前,配了一幅由宫内经厂人员所绘的全版本刻版画,使得教材内容得到了更直观的重现,加深了万历皇帝对内容的理解。插图画面精致,人物表情、服饰等细节,刻画细腻。画面场面丰富,小至街头巷尾的日常情景,大至恢弘的大内环境,生动地再现了典故中的历史场景,补充了典故原文在文字表达上的不足,清晰明了,符合幼年儿童的阅读习惯与特点。

《帝鉴图说》“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⑥的编排,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书画结合”的形式,用图展现文字的内容,文字则概括了图的大意,文与图之间,相得益彰,配合熨帖。以“圣哲芳规”开篇第一则“任贤图治”为例,插图右侧竖排一句“天下可一人主之,不可一人治之”高度概括这一则典故的主题,图后正文引《尚书·尧典》所记唐尧事迹,全文不足五十字。在正文之后,是由张居正撰写的“解”。张居正用明代白话对所选“任贤图治”一则典故进行了解释,说明了典故中所蕴含的君者应任用好能之人,共同治理国政的道理,借典故内容,启发万历皇帝作为君王的思考。这样的形式,对于当时的万历皇帝来说,学习起来并不吃力。这也是张居正作为帝师充分考虑小皇帝成长因素的体现之一。

《帝鉴图说》以“开导圣学”为宗旨,教育目标明确,内容选择恰当,采用了适切的教育方法,在万历初年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成效。《帝鉴图说》的特殊定位,也使得其在海内外传播范围更广、影响更深刻。立足于普通童蒙读物,《帝鉴图说》面世后,得益于明代木刻版画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张居正个人的声名影响,明清两朝先后有八个版

本流传于世,同时有庆长十一年活字印本、安政五年木村蔚刻本、庆安三年刻本等版本在域外流传,广泛被民间所接受。立足于幼帝启蒙读本,《帝鉴图说》在万历皇帝启蒙教育时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却又因编写者张居正政治倒台的影响,沉寂良久,直到明熹宗天启二年,才重新列入经筵日讲的书目,此后,崇祯日讲的书目也包含了《帝鉴图说》。而到了清代,顺治、康熙、同治、光绪、溥仪5位皇帝幼年即位,前朝所编《帝鉴图说》便成为了幼帝启蒙教育读本的不二之选,顺治、同治、光绪的日讲书目均包含了《帝鉴图说》^⑦。尽管,《帝鉴图说》因其编写者的政治因素,在明代皇帝启蒙教育中出现了断层,清代才重新被重视,但它在幼帝的启蒙教育上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帝鉴图说》所体现的教育目标的针对性、教育内容的匹配性、教育方法的适切性,也可供现代儿童启蒙教育借鉴。夸美纽斯所著《世界图解》,同样也立足于儿童的特殊性,考虑儿童心理、生理特殊性,以图画绘本形式,传授儿童宗教、自然、科学、社会生活、政治、道德等方面的知识,启蒙儿童识字。但在“皇帝”身份的额外要求上,《帝鉴图说》呈现出更深层次、更有针对性的要求。

[注释]

- ① 刘蕾.《帝鉴图说》及其版本丛谈[J].北方论丛,2000(5):5.“《帝鉴图说》明代有万历元年轻厂刻本、潘允端刻本、万历三年郭庭梧刻本、万历三十二年金濂刻本、天启二年刻本五版,清代则有嘉庆二十四年张亦缙纯忠堂刻本、清光绪湖北江陵邓氏刻本、清光绪六年点石斋石刻本三版。日本境内还有庆长十一年活字印本、安政五年木村蔚刻本、庆安三年刻本等版本流传,法国也有彩绘版本《帝鉴图说》。”
- ② 张居正.张居正集[M].武汉:荆楚书社,1987:103-114.“谨自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善为阳,为吉,故用九九,从阳数也;恶为阴,为凶,故用六六,从阴数也”,化用自《周易》。
- ③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一八,万历元年十月乙卯。
- ④ 表格“原书类别”一栏,以《四库全书》分类为据。
- ⑤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八,隆庆六年十二月。

(下转第68页)